

“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

◎ 王 宁

内容提要 当今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始于歌德对世界文学做出的近乎“乌托邦”式的构想。歌德将“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比较文学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中国文学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历史,但是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中国文学却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被大大地“边缘化”。本文在分析中国文学为何被“边缘化”后指出,全球化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它使得中国被动地融入其大潮中;其次是中国很快适应了全球化的法则;第三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开始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全球化时代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则加速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和当代文学跻身世界的进程。

关键词 全球化 一带一路 比较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9-0001-07

我们在讨论当今的中国文学时,常常免不了提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并且自觉地将中国文学置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来讨论和观照。一般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是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的。但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决策的实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密切相关的比较文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转变:从过去的一味注重考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逐步转向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如何走向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这无疑是受到了“一带一路”思想的启发,这种转向也与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翻译的转向和全球化时代的语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本文从全球化的视角切入,据此来思考“一带一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

一、比较文学的现状:全球视角的反思

全球化这个话题已经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了20多年。确实,经过这20多年的讨论甚至辩论,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化早已不再被人们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领域内的现象了,因为它已经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及其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必然涉及翻译,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更是如此,因为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了学科,它的特征就体现于它所研究的是跨越国别和文化传统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因而我们从事不同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时不可能离开翻译。既然学者们大都认为,翻译有不同的类别,因此对翻译现象的研究就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我们往往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14ZDB082)



更注重一国文学在另一种语言或文化语境中的批评性和创造性接受以及这种接受与影响甚或变异所产生的后果。我将进一步探讨西方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进而展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的翻译是如何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式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有所不同,而且与自己的古代传统也大相径庭。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才能够既与西方现代文学进行对话,同时也与自己的传统进行对话。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语境中从事跨越语言界限和文化传统界限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就是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ed)在文化上的实践。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已经越来越带有了世界文学的特征,因此我在本文中首先要讨论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因为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另一方面,全球本土化的世界文学实践必定有一种中国的版本,或者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全球本土化的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它消解了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思维定势,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之林铺平了道路。

正如上文中所提及的,从事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从比较的和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翻译,由于文化研究的影响和冲击,比较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研究以及翻译研究相融合,因此便在文化研究的大旗下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同时涉猎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尤其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①甚至呼吁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同时认为文化研究中也应该出现“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翻译应当继续在人类知识领域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全球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②

在全球化的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也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巨大变化,世界文学愈益成为一个同时对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都有着极大诱惑力的话题,许多文学和翻译研究者也都介入了这方面的讨论和争论。但是全球化的影响往往体现在它的双向旅行:从西方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到西方。在这个

全球化的时代,既然“所有的认同都变得混杂了,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再现的表演性特征,”^③因而从事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便更具有挑战性。在这方面,翻译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它对于重建民族/国别文学进而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的版图将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这样的翻译早已大大地超越了语言转换的浅层次,达到了文化互动和对不同的文化进行重新定位的高度。翻译研究不仅对翻译实践有所帮助,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继续对“全球本土化”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构作出贡献。因此,在呼唤翻译研究独立于比较文学学科时,巴斯奈特曾断然宣称:

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气数已尽,如女研究、后殖民理论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著述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我们从现在起应该将翻译研究视为一个主干学科,而将比较文学当作一个虽有价值但应置于翻译研究之下的研究领域。^④

这一观点虽然近乎偏激,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也不无道理。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研究在经历了“文化转向”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而翻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不同的语境下重建世界文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世界文学则反过来又帮助比较文学走出了危机的境地。在这方面,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给予翻译以应有的重视都不为过分,尤其是当我们从事世界文学研究时更要重视翻译的作用。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就是世界文学。讨论世界文学还必须涉及文学的经典化,在使得世界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20世纪最有权威的机构就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通过给优秀的作家颁奖甚至能够操控一个作家的声名,而获

^① 在这方面,尤其可参阅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

^② Ning Wang “Translation and the Relocation of Global Cultures: Mainly a Chinese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 2, no. 1, 2015, pp. 4 ~ 14.

^③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5.

^④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161.



此奖项则完全可以使一个不太知名的作家变得声名鹊起,他的作品也随即迅速成为经典。这一点尤其在中国十分明显: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奖后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争相购买他的作品,各大电视台争相购买他的著作的改编权和拍摄权,使得他的作品有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读者及观众。相比之下,与他水平和影响相当但却未获此殊荣的作家则远不如他那样走红,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也时有发生。正如瑞典文学院前任常任秘书贺拉斯·英格达尔(Horace Engdahl)所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依赖于施莱格尔兄弟那里形成的西方的文学理念。”^①至于说它对于经典化的权力而言,他认为,“[经典性]是一些不可控制的力量中的作用,它不可能形成一种封闭的可识别的体系。文化权威只是这些力量中的一种而且也许并不是最强有力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年来所积累下来的象征性力量并不足以使一位作家经典化,但却足以引发后代人对他的兴趣。”^②我认为这后一种力量显然已被证明在当今尤为明显:获得诺奖将使该作家迅速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接下来他/她的作品便会很快跻身世界文学的行列,至少收入各种世界文学选集的几率会大增。此外,作家及其获奖作品也会有很大的市场,并且被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学者讨论和研究。因此在这方面,翻译必定会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高行健的《灵山》十分有幸地遇到了优秀的英译者陈顺妍,而不少同类作家却没有这种运气。莫言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则更是如此:葛浩文的英文翻译实际上是用优美道地的英语将莫言作品的故事重新讲述了一遍,如果没有葛浩文无与伦比的英译文,莫言的获奖至少会被延宕一段时间,或许他一辈子都会与诺奖失之交臂,这样的例子在诺奖的颁奖史上可以举出许多。^③

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也并非固定的概念,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不断地受到比较文学学者和理论家的建构和重构。此外,作为一个不断地引发讨论甚至争论的“旅行中的”理论概念(traveling theoretical concept),世界文学也旅行到不同的国家,并且在旅行的过程中因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体,从而也就能够使其保有“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④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世界文学问

题在当今就更有着重要意义:当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年代时,中国文化和文学也相对封闭和落后,基本上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无甚地位,因此对作家来说唯有通过大量译介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一手段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使其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缩小与世界文学的差距。而在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再加上适得其时的“一带一路”战略方针,可以说,中国文学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又一个鼎盛的时期,并开始逐步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抓住全球化的有利契机努力发展中国文化和文学,使其再度以自己的卓越成就跻身世界文学之林。

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积极和消极成果的话,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暂时的结论:在将各种西方文化和理论思潮引进中国的同时,五四时期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即将中国文化和文学推向世界。同样,在摧毁孔家店的同时,他们甚至将儒学中的积极方面也一股脑儿地排斥了出去,进而导致了当代中国出现的“信仰危机”。这种惨痛的教训足资我们深刻反省。“一带一路”战略决策的实施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儒学并将其人文主义的因素重新发扬光大,并赋予其当下的意义。

二、“一带一路”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状况

“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因此毫不奇怪,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吸引了国际媒体和主流学界的关注。所谓“一带一路”,也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①②} Horace Engdahl “Canon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The Nobel Experience,” in Karen - Margrethe Simonsen and Jakob Stougaard - Nielsen, eds., *World Literature, World Culture*,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04-210.

^③ Ning Wang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Angelica Duran and Yuhuan Huang, eds., *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67 ~ 181.

^④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Hannah Arendt, eds.,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p. 73.



的简称,这是中国政府为了中国的当下和未来经济发展所实施的一个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战略方针。但是它的意义绝不止于经济和政治,它之于文化和文学的意义也不容忽视,它至少激发了中国作家和人文学者不仅要继续为国内的中文读者而写作,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为全世界的读者而写作,这样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的成果就有可能为世人所知,并最终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此它完全可以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激励中国的人文学术在国际学界发挥更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当前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和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始于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假想,中国文学曾经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在唐代甚至达到过文学的巅峰,并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文学。今天的世界文学史编撰者要想使得一部世界文学史更为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学的全貌,不可能不包括唐代中国文学的巨大成就。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歌德当年并未能读到唐诗以及其后同样有着巨大成就和影响的宋词和明清小说,如果他有幸读到这些优秀作品的译本的话,必定会对中国文学的巨大成就惊叹。但是,在过去的二百年里,由于经济的落后和封建统治者的无能,再加之内部的政治动乱,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被大大地边缘化了。一方面,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国家以及俄苏的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被译成世界主要语言者却寥寥无几。比较文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与世界交往的窗口,使我们得以走出封闭的一隅。借助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和繁荣,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并在2012年拥有了自己的诺奖得主莫言。有鉴于此,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和文化正在经历一种“非边缘化”和“重返中心”的过程,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中央帝国”之别称,而且儒家哲学中的“天下观”也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世界主义思想有着平行的关系。尽管后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崛起,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有所削弱,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成了最为受益的国家之一。根据中国的“全球本土化”实践来考察,我认

为全球化在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时中国只是被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但在第二个阶段,中国迅速地调整了自己使其很快地适应了全球化的法则;在第三个阶段,也即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便开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充当领军的角色了。^① 对此连最想唱衰中国的西方主流媒体也难以否认。现在处于“一带一路”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无疑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它完全可以努力使自己再现往日的辉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之林。

但在展望这种美好愿景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另一个严峻的现实,即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与其强大的经济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中国与外部世界一度隔绝,而且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很少受到外来影响,但是中国仍然与外部世界有着一些接触。诚然,中国在古代发展得很快,唐朝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不仅政治稳定,经济富庶,文化和文学也十分繁荣。因此不仅中国本身被世人称为“中央帝国”,同时也被称为“诗歌王国”,因为唐诗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相比之下,欧洲仍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美国甚至还未诞生。但是后来的世界格局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近代中国沦落为一个二流的封建专制大国,而此时的欧美国家却在飞速发展,中国这个昔日的“中央帝国”被放逐到了世界的边缘。尽管如此,中国文学依然感染了歌德,促使他通过翻译的中介读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后突发奇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这也绝不是偶然的。

不可否认,歌德本人也是最受益于翻译的,因为通过翻译他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声誉都得到极大的扩展,他的作品也借助于翻译从德国旅行到整个世界。虽然年迈时,他本人也被“边缘化”,那些青年批评家们认为他“保守”和“过时”,但正是由于他的作品被译成了多种欧洲的主要语言,他本人也成了全欧洲都有名的作家。在欧洲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誉满欧洲就等于名满世界。再加上他本

^① Ning Wang "Globalisation as Glocalisation in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11, 2015, pp. 2059 ~ 2074.



人对东方文学的兴趣以及他的作品在一些东方国家的译介和接受,歌德无可争议地成为顶级作家之一。这样一位蜚声世界的作家和思想家呼唤世界文学的来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尽管上述事实说明了中国文学曾经有过的辉煌和重要影响,但自清朝后期以来它依然一直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处于边缘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情形,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将西方的文化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大面积地译成中文,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使得中国与世界相认同。由于这种全盘西化的原因,中国的文学翻译陷入了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畅销不衰,而译介成外文的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则为数不多,有时即使有了多种语言的译本,但却因为流通渠道不畅而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缺少优秀的中译外译者;另一方面则在于西方学界和大众媒体中一直流行的东方主义的偏见在作祟。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学也像其他地方的文学一样,受到全球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冲击,严肃的文学和精英文学研究抵挡不住这一冲击因而处于衰落的境地,尤其是互联网的崛起更是使得今天的青年学生热衷于网上阅读,而较少泡在图书馆里尽情地享受读书的乐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到,全球化在使得民族文化趋同的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使其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机遇。为了促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一些中国学者和翻译者,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中国文学过去之所以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是因为翻译的缺乏。也即我们很少将自己的优秀文学作品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尤其是英语。或者即使我们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外文,其译文质量以及读者面都难以令人满意。而国外汉学家中能够致力于将中国文学译介过去的优秀译者也凤毛麟角。这正是中国文学至今仍处于边缘地位的部分原因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全球化时代的市场规律。随着高科技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纸质图书的市场日益萎缩。当前图书市场的境遇更为糟糕,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实体书店关门的消息。今天,任何一家英美国家的

书店,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都不多见,更不用说那些直接用中文原文写作的作品了。但是中国的书店,却很容易见到数量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译本,还有许多人文学学术著作的中译本,甚至连一些影印的原文作品也不乏众多的读者。而相比之下,中国作者撰写的同类书籍的销量则无法与之相比拟。今天的青年人对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推崇大大超过了对中国作家和思想家的推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根据我的初步观察,至少有下面三个原因。

首先,由于长期以来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广大读者对东方国家及其人民,包括中国和中国人民,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偏见。许多从未来过中国的西方人甚至认为,中国现在仍然贫穷落后,中国人的不文明程度与西方人相比仍然差距甚大,因而他们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再加上西方主流媒体的歪曲报道,中国的国家形象更是被扭曲了。确实,根据我本人的观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形象有着巨大的反差。这些无疑都影响了普通的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兴趣。

其次则是优秀的翻译的缺席。正如我们知道的,中国的外语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教育产业,许多出版社正是靠着这一产业赢得了巨大的利润。虽然随着汉语在全世界的推广,外语教育产业在中国有所衰落。但中国的大中学校师生仍然相当重视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学,几乎成为中国大多数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但事实上,中国高校的大多数师生,甚至包括英语专业的师生,在学了多年英语后也只能阅读一般的英文书刊,并没有从事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因此较之其他学科的师生,他们反而更难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更无法与西方以及国际学术同行进行深入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尽管许多中国学者有能力将外国的文学和理论著作译成中文,但能够将中国的文学和学术著作译成达到发表水平的外文的译者还是凤毛麟角。一些中国的主要学者仍然在等待被西方的汉学同行“发现”,希望他们能将自己的著述译成主要的西方语言,进而产生国际影响。但除了少数佼佼者,大多数人只能像“等待戈多”那样毫无指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过《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的例子。^① 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论证我的上述观点。我依然认为,要论语言上的对应和忠实程度,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堪称上乘,但是要论译本的可读性和优雅程度,霍克斯等人的译本则远胜过前者,因而它在英语图书市场上的畅销就不足为奇了。而相比之下,杨译本却长期以来放在欧美大学的汉学图书馆里偶尔为一些汉学家或翻译研究者查阅,而鲜有普通读者问津。因而作为文学和翻译研究者,我们应当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优美地道的英语以便这些译本能够直接进入英语国家的流通渠道和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② 这应该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一个实际问题,否则的话,即使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将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译成了英文,也无法使其进入英语国家的图书市场和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更遑论去影响他们了。

第三个原因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当今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消费社会,在这样一个受制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严肃的文学和其他高雅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挑战。由于有着高雅审美内涵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与当下的消费社会现实相距甚远,即使有了比较好的英文译本,这些作品也很难吸引当代读者。如果我们仅仅在字面上忠实地将其译成英文或其他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也很难得到广大读者大众的欣赏,更谈不上市场效益了,根本无法与西方文学或理论著作在中国所受到的追捧相提并论。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由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即使翻译成英文或其他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也很难与西方文学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相比拟。更为糟糕的是,在许多人看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将西方文学和理论大师们的作品译成中文,以缩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至于将中国文学译成外语,那不应该是我们中国译者的任务,我们应该等待以外语作为母语的译者来承担这项工作。^③ 这种看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外国的译者不去做这项工作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只好等待“戈多”了。这样便造成了当下中国的文学和理论批评界翻译的不平衡状况。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期待一个真

正的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

三、呼唤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主义视野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年歌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世界文学”的假想,除了他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外,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那宽阔的世界主义视野:他不仅关注自己的民族/国别文学,同时也关注那些非欧洲国家的文学,包括中国、印度以及波斯的文学,这在欧洲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谈论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实际上就涉及一种态度和视野。文化上的世界主义首先并非意味着文化趋同性,它实际上更注重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即使我们同样讨论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这样的话题,但是也依然承认,世界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而非只有一种形式。这方面我已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作过较为详细的讨论,此处毋庸赘言。^④ 既然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所探讨的是人类所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那么它就应该描写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在纽约、伦敦、巴黎和上海这样的有着鲜明世界主义特征的国际大都市,来自不同民族的居民可以共同相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他们无需放弃自己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照样可以和谐相处。

其次,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推行一种普遍主义,而更多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主义:前者指一种宽容态度,后者则诉诸一种共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世界主义所采取的态度是,任何国家,不管它强大或者弱小,不管它贫穷

^① 这两种主要的英译本是:杨宪益夫妇翻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rans.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4 vol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1), 1978-1980 第一版;霍克斯和闵福德翻译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first eighty chapters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and last forty by John Minford, Penguin Classics o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5 vols., 1973-1980)。

^② 参阅拙作《中国文学如何有效地走向世界》,《中国艺术报》2010年3月19日。

^③ 这方面尤其可参阅黄忠廉《文化译出谁主译》,《读书》2015年第10期。

^④ 关于世界主义的不同形式和维度以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参阅拙作《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文学理论前沿》,2012年第九辑,第3~29页。



还是富裕,不管它处于东方还是西方,都应当一律受到平等对待,既然它们同属于一个更大的社区,那么它们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也应当受到尊重,不应强求一种价值观或文化习俗。之于人类就更应该如此了:一个人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地位高低,也不管是男是女,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我认为这才是适应当今世界潮流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基本内涵。

第三,世界主义并非要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相对立,因为一个人可以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热爱整个世界,同样,一个有着广博胸怀和全球人文关怀的人对自己的祖国更应该有着至深的感情和依恋。因此世界主义与后二者不应全然对立,而应当共存。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他除了热爱自己的同胞外也应该热爱其他国家的人民。此外,作为一位地球公民,他不仅要热爱人类,同时也要关爱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和自然资源。当前,中国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但是这种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有些自然资源,例如石油和水,是不可再生的。因此作为地球公民,我们不仅要关爱自己的本国和异国同胞,同时也应该珍惜动物和自然资源,呼唤一种伦理世界主义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当前,更有利于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第四,呼唤一种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排除国家的疆界或国家的主权。在我看来,这同时也是其他有着广阔的世界主义视野的人的共同看法,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形式的世界主义:有根的(*rooted*)世界主义和无根的(*rootless*)世界主义。前者指那些有着坚实的民族-国家根基但同时又有着丰富的海外生活经历的人,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却依然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土壤里,与自己的同胞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则是浪迹天涯、漂泊不定的流散族群,他们居无定所,四海为家,有着天然的世界主义情怀。文学创作和批评也是如此。作家不仅要为自己本国的读者而写作,而且也要为潜在的国际读者而写作。批评家不仅要讨论本国的文学现象,而且也要讨论世界文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这样他就有幸使自己的作品旅行到世界其他地方并产生国际性的影响。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既然世界主义在不同

的国家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形式因而将朝着一种多元的方向发展,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单一的世界主义。现代中国也曾出现过一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新人文主义运动,那场运动的一个“核心的使命就是试图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代码,以便于阐释基于传统的东西方哲学教义之上的人性。”^①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不恰当的“普遍主义的”企图而导致了这场运动尚未达到在中国的文化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就夭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文主义既是一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人文主义,同时又产生自儒家的教义,因此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体。当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谈论世界主义时实际上正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但同时又具有一种面对世界的广阔的全球性的人文关怀。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最理想的世界主义形式。在本文即将结束的这部分,我仅略微探讨一下“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国的文学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为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指明了发展的方向:走出封闭的一隅,努力使自己摆脱边缘的境地,进而在全世界发挥更广泛的影响。既然文学是文化的最高级的产品,那么这对中国的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在过去,我们为了草创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从西方借鉴了许多理论和方法论。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继续这样。但是这并非我们最终的目的。既然古代的丝绸之路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化从东方向西方运动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更加能激励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比较文学研究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它不仅号召我们为本国的读者和学界有所贡献,同时也激励我们为国际学界和广大读者作出贡献。我想这应该是“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① Li Tonglu, “New Humanism,”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69, no. 1, 2008, pp. 61 ~ 79.

